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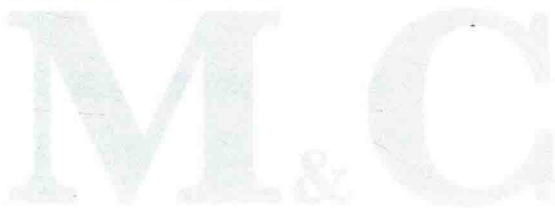
M & C

新时代、新期待： 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调查报告

李良荣 郑雯 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上海市社科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项目

“新时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舆论引导”（项目编号：2018XAA049）项目成果

新时代、新期待： 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调查报告

李良荣 郑雯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代、新期待: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调查报告/李良荣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5

(传播与国家治理丛书)

ISBN 978-7-309-14272-3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人民生活-调查报告-中国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9053号

新时代、新期待: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调查报告

李良荣 等著

责任编辑/刘 畅 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10 千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72-3/D·982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李良荣*

新媒体正在广泛、深刻、持久、全方位地改变着世界。

新媒体凭借何等魔力能以如此广度、深度、速度改变世界？无他，新媒体对人类的本质意义在于通过技术把赋予民众的传播权利(Right)变成了传播权力(Power)，真正实现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公开发布任何信息和意见。由此，公共传播由过去被极少数人所垄断的局面演绎成为全民狂欢、众声喧哗，宣示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从而，信息流量、信息流速、信息流域、信息流向都以几何级数增大、增强，水银泻地般浸润着、冲击着、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的方方面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必然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调整。当今中国的种种变化，都是这种深层社会关系调整的表现；而且必须顺应这种关系的调整才能窥得未来的方向。

在新媒体引发当代中国的种种变化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新媒体为中国的各级政府营造了全新的执政环境。

这种全新的执政环境以一句形象的话表达就是：过去政府“说一

* 李良荣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不二”，现在大众“说三道四”；过去政府“吆五喝六”，现在大众“七嘴八舌”。这种改变，表明过去“一种意见”“一言堂”“舆论一律”的“一元化”执政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显现出政府的一元意志与社会各种群体利益的多元诉求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如何降低摩擦、推动社会理性进步？这其中，传播的力量不容忽视。

政府必须保证政令畅通才能顺利行政，这需要传播的力量。

当今中国早已形成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针对政府政策，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诉求，过去只是私底下的“牢骚”，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表达，甚至向政府叫板。这样一来，政府必须在与众多意见的博弈与协商中才能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社会共识。这也需要传播的力量。

然而，这也是党和政府自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挑战。面对这样新的执政环境，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政治改革新目标。这一“现代化”被认为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系列丛书就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中心议题是讨论新媒体传播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服务于党和政府在新的执政环境下治国理政方略的变革。

这是新的课题、新的探索。我们的书中观点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也可能会有偏颇，但我们会继续前行。

李良荣

2014年10月26日

总 序 / 1

第一章 新时代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观 / 1

第二章 中国东部地区美好生活观调查 / 12

“生态”与“发展”的交织：城郊一体化浪潮中的崇明人 / 12

时代精英的焦虑与梦想：金融大国崛起背后的陆家嘴青年 / 25

忙碌而不迷惘：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浙江中小私营企业主 / 38

渴望尊重：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广东省公务员 / 55

成长的烦恼：国家政策适应中的港澳台学生 / 70

第三章 中国中部地区美好生活观调查 / 85

平凡的期望：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山西省公务员 / 85

与政策同行：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山西私营煤矿主 / 98

期待心灵扎根：中部崛起背景下的郑州市“新移民” / 111

梦在何方：城乡融合中的安徽农民工 / 121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教育改革中的安徽知识精英 / 137

第四章 中国西部地区美好生活观调查 / 152

美丽之外：新农村建设中的成都市高院村村民 / 152

信仰梦想、信仰奋斗：双创浪潮中的成都市 90 后大学生 / 166

知足而独立：追赶新时代的重庆市离退休人员 / 179

欲摘贫困帽，先戴文明帽：脱贫攻坚战中的南疆贫困农民 / 199

第五章 中国东北地区美好生活观调查 / 213

认真留守：新人口迁移浪潮中的东北小镇青年 / 213

光荣、生存与美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三代国企人 / 229

参考文献 / 246

后 记 / 257

第一章

新时代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观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美好生活追求。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战争年代,人们渴求稳定的家庭生活,“家有三亩田,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人民普遍的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盼望现代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美好生活的标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追求现代化,“三转一响一咔嚓”是城镇人的追求。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又有了全新的追求。

从历史上看,“人类生活需求”是一个自人类出现开始就亘古不变的议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并且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①马克思对于人类生活需求的这段论述,强调了生活需求之于人类历史的基础性的重要价值。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需求进行详细论述时认为,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与特殊需要。基本需要是全人类共同的需要,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具有似本能的性质;特殊需要则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各自不同的需要。

一方面,人类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正是因为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类的生活需要，人类社会才得以发展。人类的生活需要不仅局限于个体，更与社会、国家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从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出发，人的需求的满足驱动了社会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联性。进一步探索人的需要对于社会的作用机制，则要区分人的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两个概念。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矛盾。这时，公共利益通过国家的姿态来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人的需要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高层次驱动，主要是通过“社会需求”来实现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应该是平衡而共存的^①。马斯洛虽然是从个体出发研究需要，但是，当他谈到个体的基本需求、特殊需求等问题时，同样是将人看作“社会人”，人的需求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又是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多元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个体在同一时间会有多种需求，例如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而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实际上是具有共时性的；二是人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②。而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体需求既有相似之处，也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个体作为“社会人”的属性具有密切关联，例如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基本需要和特殊需要，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个体需求的差异化。

从实践层面看，由于“人类生活需要”这一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因此，围绕“人类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等议题已有大量研究案例，在操作层面将“人类生活需要”“美好生活”等概念进行了概念化和操作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就对生

^① 鲍宗豪：《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需求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第64—73页。

^② 参见[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活质量测定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但过往研究多是将人均GDP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有了新标准。例如,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认为:GDP无法显示小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以及他们玩耍时的快乐,也不能衡量婚姻、智慧等情况。为了更好地呈现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学术界开始讨论将家庭情况、教育情况、空气质量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从现有文献看,学术界对于美好生活的评价标准体系众多,例如人类发展指数(HDI)、社会进步指数(ISP)、社会发展指数(SDI)等,OECD国家^①建立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是目前公认的衡量生活质量较为有效的指标体系。该指数认为,美好生活由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生活品质两大要素组成,其中构成“生活品质”的元素复杂得多。该指标体系将“美好生活”操作化为11个指标进行测量,分别是:住房、收入、工作、社会、教育、环境、公共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和工作生活的平衡。OECD运用上述11个指标对其34个成员国和俄罗斯、巴西进行测量,自2011年来,每年都根据测量结果发布美好生活指数报告。另一个相关研究是联合国自2012年以来每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以2016年发布的报告为例,研究使用“坎特里尔阶梯模型”(the Cantril Ladder)将幸福操作化为6个方面的内容,包含社会支持、收入、人均期望健康寿命、政府和商业上的信任度、生活自由度和社会慷慨度。

上述研究对于“人类生活需要”“美好生活”等议题展开的测量,呈现了全人类在生活需要方面的共性。事实上,对人生活需要、美好生活的探索并不只是西方文化的专利,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的关注也颇多。例如传统儒家学说中,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有中国民间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在巴黎。

常有人供奉福禄寿三位神仙，又如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总要送上“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快乐幸福”等祝福，这都反映了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进行研究，要特别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特性。正如有研究指出的，“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人类最基础的需要动机上，中国与西方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在更高层面的社会文化性需求层面，则可能是殊途的”^①。

当前，围绕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这一议题的实践和摸索，以及依托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凝练出的中国特色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始终致力于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而奋斗。毛泽东非常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他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②。邓小平也始终关注人民生活质量，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要将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这是对当下中国人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概括和系统阐述。

二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围绕中国人的生活需求、中国人的幸福生

① 钟年、王堂生：《文化心理学视角下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20—27页。

② 石学峰：《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确立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探索及现实启示》，《理论导刊》2014年第2期，第69—71、112页。

③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活等议题,展开理论层面的社会研究和数据层面的社会调查,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幸福感”。社会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个体从整体上对生活满意的心理状态。而中国人的幸福感可以分成人际关系和谐、得到他人尊重和赞扬、物质需求的满足、工作成就、社会比重占有和心灵的平静六个维度^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社会结构、生活质量及两者间的内在连接机制作为总的议题框架,将生活质量分为五个维度:健康层面、人口层面、心理层面、社会经济层面和政治/社会层面,并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调查社会结构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内在连接机制。

三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人的生活需求、生活追求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需求”更加偏向物质化。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需求的探讨也更为全面。例如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研究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出发,认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对于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②。

尽管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管理学等诸多研究从各方面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但当前研究往往将中国人视为一个整体,或过度关注通过数字、数据对中国人民需求的解读,缺乏多元化视角,也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较少根据当下中国的多元化格局区分中国人生活需求的基本诉求与特殊诉求。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新时期,社会利益格局进一

① 张玮、何贵兵、成龙:《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国人幸福感的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52页。

②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第8—21页。

步分化，分区域、分群体、分年龄、分阶层展开系统性的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在数字、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更加真实、生动地记录当代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与此同时，伴随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进一步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亦愈发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围绕“新时代”背景，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既是对十九大精神的深入贯彻，也是对这一代中国人生活追求的真实写照。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是国家制定政策的前提、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也是我们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立足点。

本研究围绕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展开，通过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和对多元地域、多元社会群体基本诉求、特殊诉求的归纳，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矛盾进行兼具材料生动性和学术深度的解读；对新时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对十九大精神进行系统、全面地阐释。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通过扎实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研究，打破以西方案表为中心的研究惯性，创造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的深度社会心态调查体系，是有益的学术尝试；二是打通从受众需要到国家治理的研究路径，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三是基于丰富的经验材料，丰富“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内涵，拓展学术研究范畴。

本研究的核心立足点有二：其一，中国当前处于新的时代背景是理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的关键问题。中国正处于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当前中国区别于世界各国的特殊国情，更是当前中国区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特殊国情。因此，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是对中国研究的充实和突破。具体来说，根据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主要包含五个维度的内涵，分别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①。其二，中国当前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理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变化的关键动因。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本研究依托上述两大立足点，始终将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置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中，置于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宏观格局下，对多元社会群体的美好生活观进行分类概括。

本研究把中国大陆地区划分为四大区域，在中国东部、中国中部、中国西部和中国东北分别设立多个研究点。每个研究点通过焦点小组和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所在区域完成3—5个各具特色的群体报告，以突出各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的丰富多样的美好生活需求。之所以结合地区、阶层、年龄、职业这四个指标进行分类，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当前国情的考量。其中，以地区分类主要考虑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仅考虑到东部沿海、中部、西部等地区的区别，还考虑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小城镇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和乡村之间的区别；以阶层分类主要考虑到各个阶层之间的物质水平和精神世界的需求不同，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各个阶层之间的分化，使得研究各个阶层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特殊诉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年龄的人群需求也不一样，尤其是在互联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新生代，他们的诉求与以往任何一代人都具有显著差异；不同职业的人看待事物具有较大的观点性差异，且关系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其社会地位。本研究选取公务员等体制内人群，高校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群，农民、农民工等底层人群，私营企业主、煤老板等高资产人士，对其美好生活诉求展开全面调查研究。

本研究共完成分地域、分群体报告 20 余份，最终收入本书的报告覆盖安徽省农民工群体、安徽省高校知识精英群体、成都市 90 后创业群体、成都市新农村村民群体、浙江省私营企业家群体、山西省煤矿私营主群体、山西省公务员群体、郑州市新移民群体、齐齐哈尔市三代国企员工群体、齐齐哈尔市留守小镇青年群体、上海市陆家嘴金融青年群体、上海市崇明岛生态村村民群体、重庆市退休人员群体、广东省公务员群体、大陆的港澳台大学生群体、南疆维吾尔族贫困农民群体，共 16 大群体。其中，每一群体确保完成深度访谈十几人到数十人不等，焦点小组若干个。

在每个群体的深度访谈中，我们将“美好生活需求”细分为生命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三项一级指标。其中，生命需求指标下包含生存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自由需求等二级指标，涉及温饱问题、住房、收入、延续生命、医疗福利、环境质量、生态观、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主体感等内容；精神需求指标下包含满意度、文化需求、个体感受、情感需求和尊重需求等二级指标，涉及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文化繁荣度、文化资源配置、文化满足、信仰、国家民族自信、家庭、友谊、爱情、个体尊严感等内容；社会需求指标下包含互动需求、发展需求等二级指标，涉及社会参与、社会交往、信任感、公平感、获得感、压力感、发展效能感、教育、培

训、互联网使用等内容。

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点宏观发现：

第一，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观是置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中，置于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宏观格局下形成的。通过对 16 个社会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几乎每一个群体的需求都有鲜明的国家印记。可以说，时代造就了美好生活，时代推动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观演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成就了东北三代国企人的光荣与梦想；城郊一体化浪潮中，崇明居民感受时代变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美丽乡村的构成愈加复杂；人口迁移浪潮的背后，东北小镇青年仍然在认真留守；金融大国崛起的背后，是以陆家嘴青年为代表的时代精英的焦虑与梦想；而公务员在享受安稳的同时，也期盼其作为社会普通人应得到的“尊重”。中国的富裕农村有一批物质丰裕、精神匮乏的村民，他们在主动拯救文化、拯救传统；另一边，创新创业浪潮中的 90 后大学生也以他们独有的“初心”，信仰梦想、信仰奋斗。还有与时代同行、与政策同行，历经中国 30 多年生产方式变革的山西煤矿私营主，以及与国家稳定紧密相连，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的新疆贫困农民。

第二，当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群体需求差异高度分化，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多元图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国人的诉求、心态、精神世界等各方面都更趋多样，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活诉求极为不同，要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必须对不同人群展开区别化研究。调研发现，不同的群体在生活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同样是农民群体，江苏农民大多享受了有车有房的丰裕物质生活，成了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他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围绕精神文化、子女教育等议题展开；而南疆农民则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驱动下，对生活充满希望。又例如，同样是居住在城市里的青年人，奋斗在上海陆家嘴的青年期待通过自身的努力早日实现在上海“扎根”的梦想，而成都 90 后创业青年则是抱着“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的初衷开启他们的奋斗之路。调研还发现，即使是同一群体，由于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所在岗位、学历等方面的不同，其诉求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江苏从事新媒体的人员内部，一线员工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经济收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一线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以文科生为主，相当一部分具有媒体经验，但是大多数对工作收入不太满意，房子仍被视为安全感的最重要保障，医疗保障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对新媒体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来说，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虽然本人不是内容的直接发布和生产者，但是对于内容有最后的审核权，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更关心其本人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与此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赡养父母和教育公平等问题更受其关注。

第三，随着中国民众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人民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不断提升，对更加丰富、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是当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例如，在江苏的富裕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是富起来之后的当地农民最大的困扰。村里的年轻人多是奔走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村中的老年人因为休闲娱乐方式单一、子女陪伴较少，普遍期待更为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的乡村建设不仅需要构建“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还迫切需要“色彩斑斓”的文化氛围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又例如，重庆市的离退休群体、山西的公务员群体、陆家嘴的金融青年、南疆的贫困农民群体、崇明居民群体等各类群体，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尚未达到满足。由此可见，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建设体系还不足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需要高度重视文化产出质量，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化公共文化构建与导向，拓宽公共文化获取渠道，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总体满意度。